

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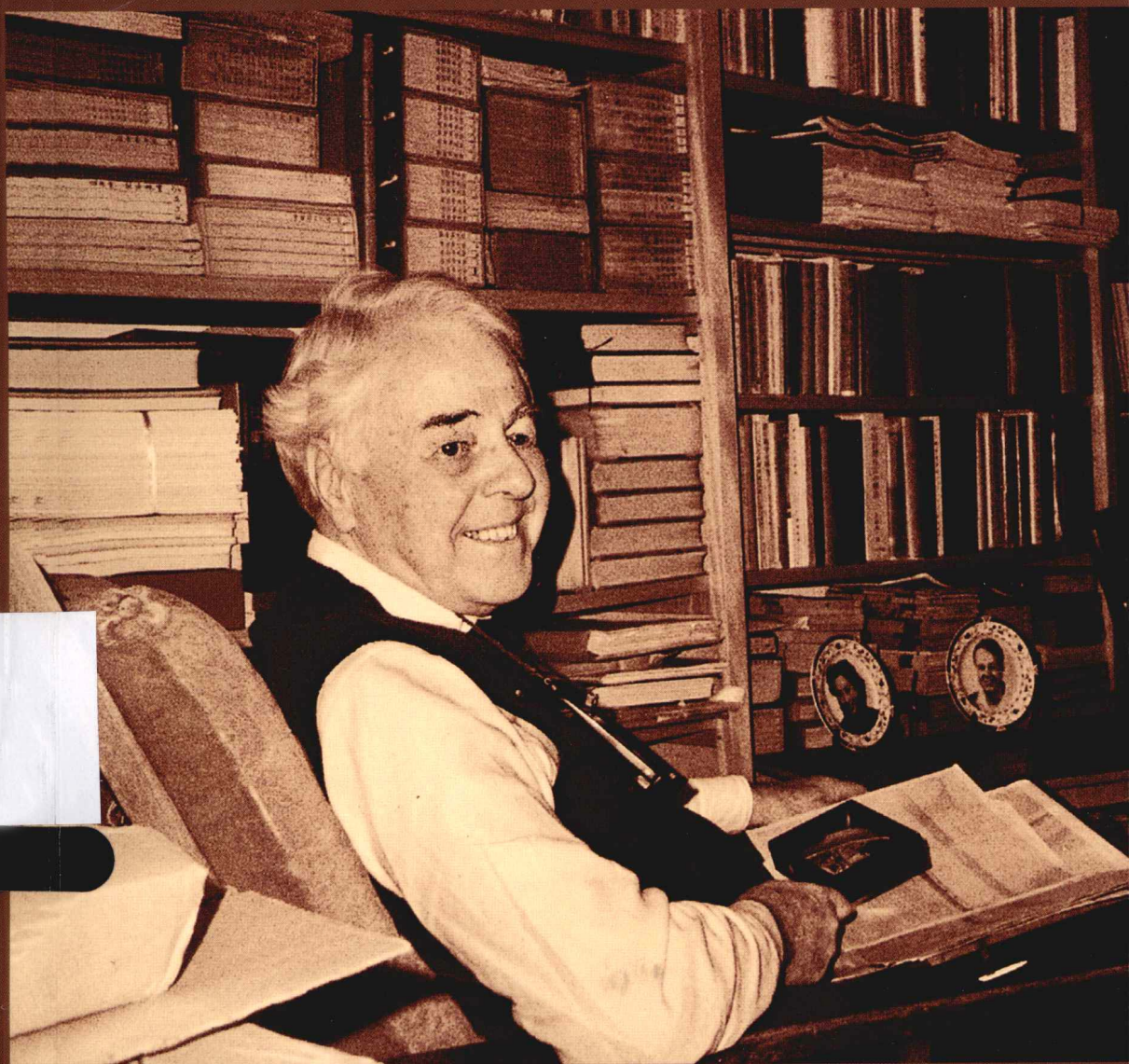
〔德〕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 著

为中国着迷

一位汉学家的自传

Im Banne Chinas

欧阳晔/译 李雪涛 苏伟妮/校 〔德〕傅復生 (Renata Franke) / 审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为中国着迷

一位汉学家的自传

Im Banne Chinas

〔德〕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 著

欧阳彪/译 李雪涛 苏伟妮/校

〔德〕傅復生 (Renata Franke) / 审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 / (德) 傅吾康著；欧阳颺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
ISBN 978 - 7 - 5097 - 3961 - 7

I. ①为… II. ①傅… ②欧… III. ①傅吾康 (1912 ~ 2007) - 自传
IV. ①K835. 165.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0353 号

为中国着迷

——一位汉学家的自传

著 者 / [德] 傅吾康
译 者 / 欧阳颺
校 者 / 李雪涛 苏伟妮
审 定 / [德] 傅復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冯立君
责任校对 / 柏 桐
电子邮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961 - 7
印 张 / 35
字 数 / 520 千字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2 - 755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9.00 元

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感谢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
为本书的出版提供的赞助

中文版前言

傅復生博士

(Dr. Renata Fu-sheng Franke)

我非常高兴，能在我已故的父亲、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出版他的自传《为中国着迷》中文版。

该回忆录原文为德语，分上、下两册。现在，呈现给中文读者的是将两者合并起来的一套完整传记，记录了我父亲从出生至 1998 年的大半生经历。自传上部（1912 ~ 1950）讲述了他的青少年时期、校园时期、汉学求学时期以及解放以前在中国的 13 年岁月。自传下部（1950 ~ 1998）包括了他在汉堡担任汉学教授的职业生涯，在美国、马来西亚、日本、中国等地担任客座教授和研究员的见闻，以及参加世界各地的会议或者旅行度假的情况。为了让大家对最后 10 年的生活留下一些印象，在自传后面附加了他定期于每年圣诞节寄给亲朋好友的 8 封年信。最后一年即 2007 年的生活，在他去世的讣告中加以简短概括。此外，德语版本中有他中青年时期的照片，此次中文版本增加了他中老年时期的几幅照片。

非常感谢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通过谢爱萍女士的介绍沟通和苏伟妮女士的具体工作，推动了这本自传的最终出版。同时，由于她们的努力，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对这一翻译出版项目给予了大力的资金支持。同样要感谢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雪涛教授，通过他的积极奔走和不懈努力，最终促成了该书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的出版。在此，一并感谢该出版社编译中心祝得

彬主任的细致工作，以及与马来西亚富有成效的合作。德国项目出版社（Projekt Verlag）的弗雷德·普施（Fred Pusch）博士慷慨地将该书版权转让给我，便于其翻译成中文顺利出版。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翻译欧阳甦，她不但很有耐心地容忍了我的所有异议和批评，同时在这一堪称榜样的合作中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2012 年 3 月于柏林

序

王 蒙

大约是我四岁的时候，父亲王锦第那年担任北京的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我们租了位于大翔凤胡同的一个二进院落居住。父亲做了装修，安装了当时极为罕见的上水下水、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迎接傅吾康叔叔的到来。

傅吾康是德国的一位汉学家，他与父亲过往甚多，在北海公园，他们似乎共同拥有一艘比较小的木制游船。傅教授多次把我放在肩上，与父母姐姐一起，到达北海公园后门，先上船坞，取出船来，再泛舟太液池上，一享清爽，我们还有在五龙亭吃小窝头、豌豆黄的经验。那是先父一生中生活比较优裕的一个短暂时期，也是我父母关系相对稳定的一个短暂时期。这个时期，对于我，是与傅叔叔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

后来直至“文革”，我听父亲说，傅教授曾在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时随同德方的政府代表团重访过北京，他们也见过面。我当时在新疆，不知其详。

1980年我首次访问联邦德国，有一站是汉堡，听说傅教授家住在那里，我很兴奋，似乎有缘与童年的、后来中断了的记忆有所续接。果然，经汉堡大学协助安排，到达汉堡当天晚饭后，我到了傅先生家，可惜，傅先生不在，我只见到了傅夫人、华裔的胡隽吟女士。我在他家的客厅墙上看到了小时我家里常常看到的郑板桥的书法拓片：“难得糊涂”。我想，也许这是父亲当年送给傅先生的吧，如果不是傅先生另有来源的话。反正我们家里，后来再没有见过这个“难得糊涂”。

胡女士原在京有房产，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她得到几处公寓房的补偿，他们一家，来中国、来北京越来越勤了。

1985年，我率团参加于西柏林举行的地平线艺术节时，又有缘与傅先生的女儿傅復生相识，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1993年，是时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做客的傅先生帮助安排了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邀请，我与妻子首次访马。

逝者如斯，胡女士与傅先生先后作古，我也年逾古稀了。2008年访问德国时会见了復生，得知了不仅傅吾康先生，傅先生的父亲也是一位德国的著名汉学家，他们的治学历程，正是中国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历程，他们是汉学家，他们也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

现在，由傅復生等编辑翻译的两代德国汉学家的回忆录即将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很高兴。历史并不仅仅是一个记载，而且是友谊，是情致，是见闻，也是命中注定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将一代一代传下去。

历史多情，历史多思，读了《两个世界的回忆》和《为中国着迷》以后，我们将会有所感悟，有所感叹。我们会尊敬与怀念在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致力于不同文化的交流的前人，我们会在会意的笑容中泛起一层泪光，愿这个德国家族的前辈友人安息，愿中德文化人的情意千秋万代地继续下去。



2009年，北京

豪华落尽见真淳*

——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中文版序

李雪涛

—

2007年9月6日，95岁高龄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 - 2007）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在德国柏林女儿的寓所驾鹤西去。一句外国的谚语说：“失去一个老人，就等于失去一座图书馆。”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同时又跨越了中西文化的傅吾康，我认为他就是一座图书馆。傅吾康分别于1995和1999年出版了两卷本的自传《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①，他在书中道出了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汉学生涯。一切都会离我们而去，而这部传记却为我们留住了一位汉学家真实而生动的一生，它所记载的是傅吾康一生的心路历程。

* 本文参考了笔者以前已经发表的三篇文章：《斯人虽已没，后世有餘情——写在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教授去世之际》（《中华读书报》2007年10月24日第18版“国际文化”），《清水一片光照人——追忆傅吾康教授》（《汉学研究通讯》2008年2月号），以及《此心安处即吾乡——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在中国的十三年（1937~1950）》（《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4）》，2009年3月），特此说明。

① 两卷本《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1912~1950）》以及《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1950~1998）》：Wolfgang Franke, *Im Banne Chinas.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12 - 1950*. Dortmund: projekt verlag, 1995, 2. Bearb. Aufl. 1997; Ders., *Im Banne Chinas.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50 - 1998*. Dortmund: projekt verlag, 1999.

几年前我在主持编译《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一书的时候^①，曾经对 20 世纪的德国汉学做过简短的概括：享誉世界的德国汉学随着德国历史的变迁经历了不同凡响的发展历程：20 世纪初，首先受到帝国扩张主义的影响。在希特勒的纳粹时代，部分学者被迫流亡。而二战后东西德的分裂，也使得双方汉学研究的路向南辕北辙：东德汉学为逃避政治的敏感而长期处于孤立地位，并遁入了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安全”研究课题中；西德汉学受到六七十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冲击，由于传统汉学过分强调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以至于使一场原本是反对权威的运动，形成了西德汉学对中国的误读。1990 年东西德的意外统一，双方的汉学又重新接轨。由此看来，德国汉学发展史其实就是一幅百余年来现代德国的政治和人文科学演变的缩影图。除了 20 世纪初受到帝国扩张的一段汉学历史时期之外，傅吾康经历了后来所有的发展阶段。他的回忆录同时也是 20 世纪德国汉学史的一个缩影。

在论及 20 世纪德国汉学的辈分的时候，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认为：

自 1905 年以来德国汉学可以分为三代：一、“父亲”的一代，他们在 1911 年前后在中国生活过，他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古典中国。二、“儿子”的一代，这些人在 1945 年以后必须重建被纳粹摧毁的汉学，而在冷战时期没有机会到中国旅行。他们主要以中世纪和近代中国作为其研究的方向。三、“孙子”的一代，因为他们在 1973 年以后可以受邀到北京去了，因此也帮助建立起了一个现代的汉学专业^②。

按照顾彬教授的说法，福兰阁（Otto Franke，1863 - 1946）显然属于“父亲”代，不过他在中国待的时间却大大早于 1911 年，同时他的研究

① 马汉茂（Helmut Martin）等编，李雪涛等译《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② 李雪涛：《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顾序”第 2 页。

领域也涉及古代和当代中国的各个方面。而傅吾康则属于“儿子”代，非常幸运的是，他曾躲过了德国的大部分浩劫和全部的战争，在中国待了13年之久。主要在北平的这些年，不仅使傅吾康打下了坚实的中国文化基础，同时也让他更加热爱这个民族及其文化。在北平由于他能有机会跟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交往，傅吾康也因此拥有了国际化的视野。此外，他也非常幸运地在40岁之前就获得了德国汉堡大学的汉学系的教席。由于冷战期间没有办法跟中国建立起联系，一直到1972年中国和西德建交之前，他根本不可能重新返回中国。他对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刻骨的爱，由于偶然的机会转到了东南亚华人那里。傅吾康建立了与东南亚华侨的关系，并且在这一方面他的建树亦颇丰。

傅吾康的文笔质朴深沉，十分感人，很少有多余的修饰成分。这样一部回忆录，除了记述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之外，更多地讲述了傅吾康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对家庭的认识，对爱情的解读，以及对汉学的热爱。上半部有一段段曲折离奇的故事，因为其中有13年（1937~1950）发生地是在中国，因此让中国读者读来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而下半部除了记载他在东南亚的有趣描写外，基本上是一本记载会议和访问的流水账。这一部分尽管枯燥，却能让人了解到很多鲜为人知的国际汉学界的人和事。

二

生于1912年7月24日的傅吾康是福兰阁教授的子女中唯一子承父业的汉学家。按照中国的说法，傅吾康可以算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了，福兰阁在当时为显赫一时的大汉学家。傅吾康实际上是在一个中国的氛围中长大的，作为汉学家之幼子，他的孩提时代的一切好像都是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由于受到这样的影响，1930年中学毕业之后，他毅然绝然地选择了汉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傅吾康在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师从颜复礼（Fritz Jäger, 1886 - 1957）、佛尔克（Alfred Forke, 1867 - 1944）、许勒（Wilhelm Schüler）等

著名汉学家从事汉学方面的基础训练，并于1932年7月获得了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的翻译文凭资格。1935年他在佛尔克教授那里做了题为《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革新尝试》的博士论文，这篇后来发表在《东方语言学院通讯》上的论文^①，赢得了众多的书评，甚至像莱顿的戴闻达（J. J. L. Duyvendak, 1889 – 1954）教授也亲自在《通报》（*T'oung Pao*）上撰文评论此书^②，这对年轻的汉学家来讲无疑是莫大之鞭策。这篇论述中国保守派与西方改良主义思想论争的专著，后来也奠定了傅吾康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

1937年傅吾康只身来到中国，辗转上海、南京等地后到达了北平，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待就是整整13年（其间只有短期在日本逗留）。在北平，傅吾康主要参与了“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的组织、领导工作，先后在学会中担任秘书、总干事以及《中德学志》编辑主任等职。从1938年至1944年，共出版《中德学志》六卷（22期）、《汉学集刊》（*Sinologische Arbeiten*）三卷，同时组织出版了“德国文化丛书”等20余种。

1941年夏季傅吾康跟曾留学德国的胡万吉（雅卿）先生的千金胡隼吟（1910 ~ 1988）女士相爱，不过按照当时帝国的法律，日耳曼人是不能娶非雅利安人为妻的，否则的话傅吾康就会被迫辞去中德学会的职务。直到1944年9月他们才正式订婚，1945年3月在战争快要结束时，终于结为百年之好。

抗战胜利后，经萧公权（1897 ~ 1981）先生的推荐，傅吾康谋得了设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教授的位子，讲授“明史”和“德国历史”等课程，并在中国文化研究所负责汉学研究西文集刊《汉学研究》（*Studia Serica*）的编辑工作。在成都两年后，傅吾康又接受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冯至（1905 ~ 1993）教授的邀请，接替了由于卫德明

① Wolfgang Franke, “Die Staatspolitischen Reformversuche K'ang Yuwei's und seiner Schule. Ein Beitrag zur geistigen Auseinandersetzung Chinas mit dem Abendland”, in: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 38 (1935), S. 1 – 83 (Dissertation).

② Duyvendak, in: *T'oung Pao* 33 (1937), S. 95 – 100.

(Hellmut Wilhelm, 1905 – 1990) 去了华盛顿大学而在北大空出的德语教授的位子。在北大期间，傅吾康与季羨林（1911 ~ 2009）等学者建立了终身的友谊。

战后的德国乃是一片百废待兴的局面，汉堡大学也在着手重新建立已遭破坏的汉学系。1949 年 6 月傅吾康得到了汉堡大学的正式任命书，他于 1950 年回到汉堡，接替了自颜福庆被迫退休后已经空置两年的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一职。来北平时只是孤寂一身的傅吾康，此时携妻带子（已有一女一子）回到了阔别十三载的汉堡。

在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的位置上，傅吾康一直干到了 1977 年退休。二战之后德国汉学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傅吾康为首的北部汉学重镇汉堡当然占据着重要一席 [其余的两个重镇分别是：以傅海波 (Herbert Franke, 1914 – 2011) 为首的南部汉学堡垒慕尼黑，以及地处东德的以叶乃度 (Eduard Erkes, 1891 – 1958) 为首的莱比锡]。汉堡本来就是德国最早成立汉学系的大学，再加上傅吾康的研究领域为明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东南亚华人历史，因此汉堡学派的研究方向主要定位在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方面。

1963 ~ 1966 年期间，利用大学和政府给他的三年学术假期，傅吾康接受了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的职位。除了学术研究工作之外，他还恢复了多年来没能成立的中文系，也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尽量多地培养华人人才。退休之后，傅吾康又应聘到马来西亚做客座教授，以专门研究东南亚华人历史。

三

傅吾康教授可谓著作等身，早在 1947 年他就发表了用英文编写的《明代史籍会考 (1368 ~ 1644)》^①，自 1950 年回德国之后，他又出版了

①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Important Literary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 – 1644)”, *Chung-kuo wen-hua hui-k'an*,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VII, (Chengtu-Nanking), 7 (1947/48), S. 107 – 224; *Studia Serica*, Monogr. Ser. A, No. 2, Chengtu 1948, 118 S.

《中国的文化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①、《1851~1949年——中国革命的百年》^②、《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③、《中国与西方》^④等一系列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

作为历史学家，傅吾康一贯重视史料的运用，并将中文文献与西文资料并重，他的《明代史籍会考》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在方法运用方面，他总是力图以西方的学术思想为出发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欧洲学界尽可能多地理解远东的文明。在《中国与西方》一书中，傅吾康便称：“跟中国人的西方观相比较，在书中我更深入探讨的是西方人的中国观。因此这本小册子署为《中国与西方》而不是反过来的《西方与中国》。作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让读者理解中国的立场以及面对西方时的中国态度。”^⑤此外，在历史的梳理方面，傅吾康从其父福兰阁那里继承了中国历史乃是一个连续发展过程的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出现的运动和观念，他总是到中国历史中去寻找根据。在《中国革命的百年》（1980年修订版）一书中，傅吾康便强调要从中国历史的整体去看中国革命的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只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他从《易经》里“革命”的概念及孟子“君为轻”的思想出发，证明了“革命”并非到近代才突然出现的西方观念，作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手段，“革命”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⑥。

① *Chinas kulturelle Revolution. Die Bewegung vom 4. Mai 1919*, München: Oldenbourg, Janus-Bücher, 1957, 89 S.

② *Das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1851 - 1949*, München: Oldenbourg, 1958, 297 S. (engl. Übers.: *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1851 - 1949*, Oxford: Blackwell 1970).

③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Univ. Press, 1960, 100 S.

④ *China und das Abendlan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2, 140 S. (Engl. Übers.: *China and the West*, Oxford: Blackwell, 1967; *China and the West. The Cultural Encounter, 13th to 20th Centuries*, New York and Evanston: Harper Torchbooks, 1967).

⑤ Wolfgang Franke, *China und das Abendland*, Göttingen 1962, S. 3.

⑥ 亦请参考傅吾康 1956 年的一篇演讲稿：“Die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von 1851 bis 1948)” [《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 (1851~1948)》], in: *Dialog*, Düsseldorf 1956, S. 53 - 66.

跟将中国看成是一堆历史的古典文明这样的看法不同，傅吾康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古代、现代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与古典语文学派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教授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他认为，海尼士所认为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汉语口语不具备学术性的观点，尽管在第三帝国的时候使汉学免遭了政治的影响，但却割裂了中国历史的传承。在这一点上傅吾康依然秉承着他父亲的观点，亦即中国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①。傅吾康对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现代汉语的重视，实际上也开启了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先河。

四

由于东南亚华侨史本身就是明清史、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1963~1966年傅吾康担任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以来，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历史的研究，也成了他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除了书本的考证之外，多年来他还利用一切机会进行田野调查，先后编成了《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萃编》、《泰国华人铭刻萃编》等碑文汇编。这些所谓“域外”华文碑铭的发现和整理，极大丰富了明清史研究的史料范围，使得明清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官方的文字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傅吾康在东南亚华文碑铭史料搜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对明清史研究来讲是具有典范作用的。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于2000年6月出版了《庆贺傅吾康教授八秩晋六荣庆学术论文集》以表彰他对东南亚铭刻资料之搜集及编纂之功^②。

① 请参考：上揭《为中国着迷》（下部）德文版，第8~9页。

② 苏庆华（Soo Khin Wah）主编《庆贺傅吾康教授八秩晋六荣庆学术论文集》（*Professor Wolfgang Franke, Felicitation. Essays in honour of his 86th birthday*），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出版，2000。本书由季羨林题写书名。几年前我在网上购得的一本，系苏庆华教授送给林国平的，上面的题字为：“林国平教授斧政。弟苏庆华敬呈。2000年8月19日吉隆坡”。

这批东南亚华文铭刻中在时间上最早的，应当是傅吾康与时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陈铁凡（1912～1992）在1972年3月在文莱一处回教古坟地中发现的一块墓碑^①。经对此块碑上所刻文字的考证，傅吾康推论出早在公元1264年，中国和文莱（婆罗洲，古代作“勃泥”或“渤泥”）就有了密切的往来。傅吾康还依据中国的典籍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碑文中的“蒲公”做了考证，认为：“他（指）可能是他们（指蒲亚里和蒲卢歇）之中的一个人的后裔。他们的家属可能如同蒲寿庚的家属一样已中国化，但仍保持他们的穆斯林信仰，并已好几代继续从事与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海上贸易。我们可以推测这位蒲公已中国化，因为他是来自泉州的一个中国官员，而且他的墓碑完全是中国式的。”^②这一南宋石碑的发现，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为研究古代中国和婆罗洲的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性文献。

在关注东南亚铭刻研究之前，傅吾康在汉学方面的兴趣主要是明清史的研究，他清楚地认识到，明代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已有的版图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由于战乱和其他原因逃亡到海外，其中在东南亚各地安家落户的华人数量尤其多。这些华人尽管生活在地理环境和文化相异的地区，但在很多方面依然保留着汉字文化的各方面特征，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华文碑铭。对于研究者来讲，傅吾康所发掘和出版的这些在当地出现的新史料，相对于源自中国传统的古典文献资料，可视为更直接的本土史料。对这些华文碑铭的搜集与整理，对于华文史料本来就非常缺乏的东南亚华人社会来讲，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对东南亚海外华人研究在史学、社会学、民俗和宗教学乃至语言学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代的学者有的甚至认为傅吾康所发掘的碑铭等文献史料跟中国传统的文献相比，应当称为“新史料”。在研究方法方面，傅吾康除了

① 1973年傅吾康和陈铁凡将这一重大发现公之于众，见：“A Chinese Tomb Inscription of A. D. 1264, discovered recently in Brunei, A Preliminary Report”, *The Brunei Museum Journal* 3/1 (1973), pp. 91-99 (together with Ch'en T'ieh-fan)。温广益的中文译文《最近在汶莱发现的一块公元1264年的中文墓碑》见：《泉州文史》（第9期），1986年，第150～154页。

② 同上书，第153页。

使用传统的对史料搜集、整理、归纳和论证的分析方法外，也格外注意引入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的各种社会学方法。

五

傅吾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快乐天性：随遇而安。我特别欣赏他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时的随和、开放的姿态。汉学的家庭背景，殷实的家境，父母有条件让他在汉学方面比同辈人更具有优势。父亲福兰阁尽管在德国驻中国公使馆做翻译 13 年之久（1888 ~ 1901），但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丝毫没有表现出趾高气扬的态度。正如福兰阁自己所描写的那样，早在他刚到中国的时候，他对中国便有一种非常开放、充满期待的态度：

从一开始我就日复一日地愈来愈明白，我来到的中国并不是像很多欧洲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度。这是在古代有着高度独立的文明的国家，并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别处人们往往只能通过别的方式，如记述、出土或者从其他方面获得断篇残简，艰难且无法完整地予以修复，在这里却是生机勃勃的当下，人们可以有意识地认识和经历这一切^①。

这样的—个立场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从福兰阁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再重复的对自然景观的迷恋和惊叹外，尽可能客观地杜绝了各种各样的偏见。傅吾康正是在这样的—个氛围中成长的，因此他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抱有跟当时大多殖民主义者不同的态度。

傅吾康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柏林的另外一位汉学家海尼士（1932 年 10 月他从莱比锡来柏林，接替福兰阁在柏林大学汉学系的教授—职），

① Otto Franke, *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 – Randglossen zu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54. S. 52.